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

Modernity as Borderland Sphere: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Goods
between Yaeyama Islands of Okinawa and Colonial Taiwan

doi:10.6752/JCS.200710_(5).0002

文化研究, (5), 200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 2007

作者/Author：朱惠足(Huei-Chu Chu)

頁數/Page：49-8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10_\(5\).0002](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10_(5).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Modernity as Borderland Sphere: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Goods between Yaeyama
Islands of Okinawa and Colonial Taiwan**

—Huei-Chu Chu

**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
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
台灣之間**

朱惠足

誌謝：進行田野訪談期間，不管是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或曾到殖民地台灣的八重山人，聽到我是從台灣來的，都親切地與我分享半世紀前的經驗與記憶，非常感謝他（她）們。兩位匿名評審提供許多珍貴意見，特此致謝。本文討論八重山人台灣經驗的部分，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NSC91-2412-H-218-001）研究成果，曾以「來自帝國邊境的近代化推動者：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統治」為題，發表於「重訪東亞：全球、東亞、國家、公民暨2002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研討會。台灣人的八重山移居部分，則受到日本住友財團2003年亞洲各國日本相關研究補助，感謝兩個單位的經費補助。

朱惠足，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huei0123@hotmail.com

摘要

本文透過戰前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人與物資的移動，討論「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如何在移動的日常生活實踐、帝國論述及主體意識的相互作用當中逐漸形成。兩地之間勞動力的交換，凸顯出帝國內部無法消弭的種種區別，雙方均設法將出身地的地緣、血緣人際網絡移植到移居地，卻也不免跟語言共同體的外部有所接觸，產生多種語言與民族的交錯與對話。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開始之後，「現代」開發與「日本」文化遠離八重山而去，之後卻又隨著八重山對殖民地統治的參與，繞道台灣再度向八重山接近。到台灣工作的八重山人在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同時，也受到殖民地台灣刻板印象（被稱為「生蕃」的原住民）與民族接觸生活實踐（漢人）兩者之間的落差所震撼。另一方面，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不但將台灣的閩南文化再移植到八重山，八重山在地社會因民族差異、被殖民者歧視與生存競爭而將台灣人移民他者化的論述，也將兩段移墾的歷史（台灣人移墾八重山、其祖先從閩南移墾台灣）加以重疊，製造台灣人為「前現代」民族之刻板印象。雙方移動的經驗呈現出「現代性」如何成為帝國政經力學牽動下，多樣民族、人種、語言、文化與歷史互相交錯、不斷重劃疆界的「交界場域」。

關鍵詞：八重山群島、殖民地台灣、現代性、民族接觸、文化移植

Abstract

Dealing with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goods between Yaeyama Islands of Okinawa and colonial Taiwan from 1920s to 194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episteme of “modernity” had been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veryday practice of movement, imperial discourses, and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fac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border island and colony, People from Yaeyama and Taiwan both created their own communities in the host societies, showing that national and ethnic compartments still existed in the empire. Modernization enterprise and Japanese culture had been diverted from Yaeyama to the new colony Taiwan, but they came close to Yaeyama again with the return of Yaeyama people who worked in Taiwan and assimilated modern culture and Japanese culture. Yaeyama people were also unsettled by the gap between the imperial discourse of “savage” Taiwanese aborigine and Ha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y actually witnessed when they arrived Taiwan. Meanwhile, Taiwanese immigrants transplanted to Yaeyama their culture, which has been transplanted by their ancestor from southern China to Taiwan centuries ago. In the discriminating opinions towards Taiwanese immigrants, Yaeyama people had overlapped these two histories of immigration to produce the stereotype of “premodern” Taiwanese people. I discuss how change of geopolitical position, inter-racial contact, and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produced in these movement has helped to constructed the episteme of “modernity” under the empire.

Keywords: Yaeyama Islands, colonial Taiwan, modernity, inter-ethnic contact,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外在於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質任何可能定義的諸發展與諸力量，不斷使其所協助建構的現代性產生轉向、改道、突變與多樣化的現象，消除該現代性所有的基本原則、特有力學與單一歷史。

——Mitchel 2000: 12

一、前言

日本沖繩(Okinawa)與台灣隔海相鄰，兩地在現代史上有密切關連。沖繩原為獨立的琉球(Ryūkyū)王國(1429-1879)，長久以來與中國有著朝貢冊封的臣屬關係。1874年，日本以沖繩離島宮古島(Miyakojima)居民在台灣南部遭受殺害¹為藉口出兵台灣，迫使清朝承認琉球王國為日本保護下的領土，進一步在1879年將琉球王國強行「處理」為日本國沖繩縣。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對沖繩影響深遠，除了徹底清除沖繩對舊宗主國中國的眷戀，還造成鄰近沖繩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剛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時日不久的沖繩，一轉成為開拓新領土台灣的前鋒。

尤其是沖繩縣離島的八重山(Yaeyama)群島，因為距離台灣最近，²早在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武力接收台灣後，與台灣之間就已出現人與物資的交流；1920年代中期以後，兩地間的往來日趨頻繁，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八重山各島嶼送出大批勞動者到殖民地台灣，³他們到了台灣之後，集中居住於首都台北及基隆、高雄港町，部

-
- 1 1871年，到沖繩本島的首里王府朝貢後踏上歸途的宮古島船隻，遇到颱風漂流到台灣南部的八瑤灣（現在的屏東縣滿洲鄉），船員當中54人被排灣族原住民殺害。
 - 2 八重山群島位於沖繩本島與台灣之間，其中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離台灣蘇澳僅111公里，行政中心的石垣島距離台灣也才277公里，比到沖繩縣政經中心的那霸（411公里）還近，更不用說到日本首都東京（1,952公里）了。
 - 3 1935年沖繩縣政府對移居殖民地的縣民人口進行調查，住在台灣的沖繩縣人有3,930人，其中來自八重山地區的有1,454人，占37%（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74：68）。根據同一年的日本國勢調查，八重山人口不過佔整

分的人在習得專業技術或通過資格考試後，轉而從事警察、護士等專業工作，其他大多數的人或剛到台灣的人，則以打零工、打雜或幫傭謀生。⁴相對地，最早到八重山的台灣人為商人和礦工⁵，後來則有農民集體前往開拓。根據30年代初期八重山當地報紙的報導，當時西表島(Iriomote-jima)有50名、石垣島(Ishigaki-jima)有100名左右的台灣移民開墾田地種植稻米（嵩田公民館 1996：14）。1937年，幾個台灣人資產家受到台灣總督府經濟控管政策打擊，轉移到石垣島成立「大同拓殖株式會社」，從台灣中部招募330名農民到石垣島栽種鳳梨。另外，約600名左右的個人移民租借大日本製糖會社的土地，種植稻米、製造甘藷粉。集體與個人移民的台灣農民在距離石垣市街10公里處的名藏(Nagura)、嵩田(Takeda)山上，形成千人規模的台灣人聚落（林堯 1984：31-34）。

1945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結束，八重山與台灣之間出現國際法上的界線。然而，兩地之間人與物資的交流並沒有因而終止，趁著戰後的混亂以走私偷渡的方式持續進行，直到50年代初期，國民政府與美軍統治下的琉球政府開始嚴格取締為止（石原昌家 2000）。到了60年代，一批台灣人新移民進入八重山（直到1973-1975年才得以歸化日本國籍），主要為工廠作業員、餐廳廚師等當地欠缺的技術人員。戰前到戰後初期的農業移民，加上60年代以後的新移民，目前八重山的台灣人及其子孫約有600多人，集中居住於石垣島。

針對八重山與台灣之間人與物資的交流，牛島盛光（民俗學）1970年以沖繩的文化變遷為主題的論文當中，就已將石垣島的台灣人聚落列為討論對象之一，主要調查台灣移民的家庭結構與特有民俗節

個沖繩縣的6%，可見八重山人移居台灣的比例之高（水田憲志 1998：384）。

- 4 1931年到台灣工作的843名八重山女性當中，518名幫傭，94名在旅館工作（《先島朝日新聞》1931年6月28日）。兩者合計達總人數7成。
- 5 參照三木健(1990: 37-80)對西表島礦坑台灣人礦工進行的歷史調查。1943年前後因為戰事吃緊，礦工紛紛被徵調從軍，加上運送煤炭的船隻無法航行，礦坑一一關閉。部分台灣人礦工及家屬沒有回台灣，移居石垣島務農。

日（牛島盛光1970：100-107）。經過一段沈寂之後，1989年在那霸舉辦的第二屆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當中，出現兩篇討論石垣島台灣移民的論文：簡瑞宏（社會人類學）論文為1984年田野調查的成果，對於石垣島台灣移民的移居歷史、通婚狀況、宗教信仰、現況與事業等，有相當詳細的考究與紀錄（簡瑞宏1989）；小熊誠（社會學）論文則以石垣島台灣移民的民族意識變化為主題，於1986年至1988年之間調查統計台灣移民的移居路線、出生地、從戰前到戰後與在地居民的關係、同鄉組織、通婚狀況等，初步歸納出第二代台灣移民已逐漸融入石垣島在地社會，不過近年來國際化的潮流使他們重新回頭肯定自己的台灣出身背景與文化（小熊誠1989）。90年代之後，不時有學者或研究生針對石垣島的台灣移民進行田野調查或研究，譬如野入直美（社會學）的論文為1997年與1998年的訪談成果，亦以不同世代台灣移民的民族意識變遷為主題，不過主要進行訪談內容的文本分析（野入直美2000、2001）。此外，石垣島報社《八重山每日新聞》記者松田良孝訪談石垣島台灣移民，於2003年1月到9月每週日在該報連載「我們是從台灣來的」專訪報導，詳盡介紹每位受訪者的個人史與八重山經驗，並於2004年整理出版專書（松田良孝2004）。至於八重山人的台灣經驗，以水田憲志（地理學）的研究最為詳盡。水田憲志於1995年與1997年共採訪26位戰前曾到台灣居住的八重山人，調查統計其移動經歷與職業（水田憲志1998）。水田憲志在另一篇討論台北的沖繩人女傭的論文當中，也以八重山女性為主要對象，討論她們當年在台北勞動市場當中的位置、個人經驗及遭受的歧視（水田憲志2003）。

以上研究提供許多珍貴的田野調查成果與統計數字，但多僅止於史實與現狀的整理描述，尚未針對所得數據或資料進行深入探討。同時，這些研究或談石垣島的台灣人移民如何從遭受排斥到融入在地社會，或談八重山人如何在殖民地台灣受到多重歧視並體驗現代文明，均只處理單一方向的移動，沒有意識到兩種移居經驗彼此之間的關連性。一直要到人類學者黃智慧(1995)與沖繩／台灣文學學者星名宏修(2003)的論文，才開始將兩者視為同一時空背景下的歷史事件，將其

並置討論。

我最初對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間的交流產生興趣，是因為在沖繩本島聽到兩個傳聞。一個是，八重山的與那國島(Yonaguni-jima)在戰前從台灣引進日本的榻榻米，成為沖繩縣內最早使用榻榻米的地方。另一個則是，沖繩最具代表性的農作物鳳梨，是石垣島的台灣人在戰前首先引進的。半信半疑的我實際造訪八重山，發現不只榻榻米與鳳梨，八重山人從殖民地台灣引進各種日本物資，戰前農作物的引進與改良也多與台灣有直接或間接關連，也就是說，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雙向交流，造成「現代」的日本物質文明與「前現代」的台灣農業，同時從殖民地台灣移植到八重山。因此，我認為兩地間物資的交流與人的移動，不僅是發生在同一區域的共時現象，而且都與帝國統治下的「現代性」⁶經驗密切相關。

這篇文章主要討論時期為兩地間往來變得頻繁的1920年代，到八重山海域因空襲而封鎖的1944年⁷之間，透過兩地之間人與物資的交流，討論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⁸在移動的日常生活實踐、帝國論述，以及主體意識的相互作用當中逐漸形成的過程。主要材料為2002年及2003年的夏天，我在八重山地區針對12名戰前曾到台灣工作的八重山人，以及11名戰前就已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進行訪談的結果。經過多年歲月，這些現在至少7、80歲的受訪者，大多為1930年代以後跟隨父母移居到台灣或八重山。1930年代以前早期移居者的經驗，除了透過受訪者間接了解，主要利用印刷資料，包括前述研究論文及報紙專訪、八重山人或台灣人在八重山自費出版的自傳與回憶錄⁹、將台灣人

6 「現代性」一詞具有多樣意涵，本文將其定義為十七世紀末啓蒙思想與工業革命之後，人們追求「進步」、謀求與落後的過去決裂、邁向開放的未來之文化特質。

7 當時西表與石垣兩島的所有台灣人幾乎都返回台灣，日本政府也開始命令八重山的老弱婦孺疏散到台灣避難。

8 「知識結構」(épistémè)為某一特定時代下生產出各種認知體系、科學與可能形式化系統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s)之關係的總合(Foucault 1989: 191)。

9 1980年代沖繩掀起自費出版自傳或回憶錄的風潮，多半出於一般庶民之

的舊照片與剪報依年代編輯的紀念刊物《嵩田——50年來走過的路》（嵩田——50年のあゆみ）等。自傳與回憶錄採用的是對親朋好友說故事的形式，紀念刊物則主要在宣傳台灣人在八重山地區的貢獻，我特別留意它們各自預設讀者而生產「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過程，以及它們以日語文本來呈現不識字底層人民的生活經驗與記憶之方式。此外，還參考戰前八重山地區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這些同時代的印刷媒體具體呈現當時的社會氛圍與觀點，同時也為其受限。從上述材料各自的意義與局限出發，我透過口述、印刷，以及兼具兩者性格的不同媒介，往返於不同的移動與文本之間，藉由讓它們彼此互相對話，不斷修正本文思考的方向與問題點，試圖捕捉帝國統治下兩地之間人與物資的移動，生產出什麼樣的現代性經驗與知識結構。

二、兩個同鄉會：共同體內部區分的浮現

談到當年遠赴他鄉的動機，不管是八重山人或台灣人，都異口同聲表示是爲了「討生活」。八重山人長久以來飽受孤島之苦，除了交通不便之外，更面臨統治者政治經濟的多重剝削、制度上的差別待遇，以及隨之而生的歧視。從琉球王國時期開始對沖繩偏遠離島課徵「人頭稅」，每個家庭無論貧富一律依人口數納租，並分別指定宮古群島與八重山群島居民繳納小米及米。八重山群島當中沒有水田的鳩間島(Hatoma-jima)、黑島(Kuro-jima)、竹富島(Taketomi-jima)、新城島(Aragusuku-jima)居民，只好每天越過海洋到瘴癘之地的西表島耕種，女性則晝夜不分地趕著編織納貢的麻布（西里喜行 1981：92-95）。1609年九州鹿兒島(Kagoshima)的薩摩(Satsuma)藩支配琉球王國後，八重山與宮古地區居民受到薩摩藩與琉球王國雙重的賦役壓迫。1879年沖繩納入日本版圖，八重山人並沒有因此獲得解脫，明治

手，有助填補現代史中庶民歷史空白的部分。戰前八重山人在殖民地台灣的生活經驗頻繁出現於這些自費出版品當中。

政府以「沿襲舊慣」的方式籠絡琉球王國舊貴族，「人頭稅」等苛政又延續了1/4個世紀，直到1903年才廢止。也就是說，從土地、租稅制度到地方制度，日本、沖繩本島、偏遠離島之間法制上層層的不平等構造，成為歧視與差別待遇的「物質基礎」（西里喜行 1981：135）。1920年代前半的經濟不景氣造成八重山經濟更為困頓，殖民地台灣成為提供過剩勞動人口工作機會的出口，長男以下、無法繼承土地的男丁及女性，小學畢業後紛紛離開「沒有土地、沒有資源、沒有工作的小島」，到台灣找工作。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居民談到當初渡台的經過，常會說「與那國是個小地方，相較之下，台灣是個開闊的廣大地方」，並輔以手勢表示兩者大小的差距。每年有幾次，天氣晴朗時從與那國島的西崎(Irizaki)燈塔（日本最西端的地標）可以看到台灣中央山脈的上層部分清楚浮現海上，看起來相當雄偉。不過，除了土地面積的差距（與那國面積為28.88平方公里），殖民地台灣顯得開闊與廣大，主要是因為「景氣好」、「聚集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人」。

抵達台灣之後，八重山人隨即發現日本本國對離島的多重歧視，從日本國內被帶到了殖民地台灣。在殖民地台灣，日本人的徵人廣告或啓事常附加但書：「謝絕琉球人與本島人¹⁰」，遭受排除的沖繩人大多只能從事捕魚、土木工人、小販、幫傭等勞動工作，在以殖民地官僚、公務員與公司職員等中產階級為主的在台日本人社會當中，被邊緣化到「底層」（又吉盛清1990：56）。在台沖繩人的內部，跟在沖繩縣內一樣，進一步細分為沖繩本島與偏遠離島，八重山人在工作、租屋、婚嫁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受到種種歧視，初抵台灣時只能從事不需特殊資格或技術的打雜、幫傭工作。八重山在台灣的同鄉會組織，呈現出他們面對多重歧視的對應方式。台北的「八重山鄉友會」成立於1932年，雖然是最多八重山人的聚集地，台北的同鄉會成立時間卻比基隆及高雄遲，主要是因為台北已經有「沖繩縣同鄉會」

10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將台灣漢人、台灣原住民、來自日本本國的日本人分別稱為本島人、高砂族、內地人，予以區別。

的組織存在。然而，八重山人覺得他們與沖繩縣同鄉會「在精神上有所隔閡」，與宮古群島一樣在裡面受到忽視，才決定另外組織自己的同鄉會（《八重山新報》1933年1月25日）。此外，從八重山的竹富、與那國、石垣等島嶼來的人，也紛紛各自成立在台同鄉會。同鄉會不止在異鄉提供情感慰藉，更是經濟與文化上的重要人脈，從協助找工作及租屋開始，同鄉人脈在生活層面發揮極大的功能。不過，八重山人雖然不願意被歸類為「沖繩縣」，但因為大多數的台灣人對八重山地區不熟悉，所以他們只好說自己「來自沖繩」。

另一方面，戰前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主要來自台灣中部的彰化、員林一帶。他們記憶中在台灣度過的童年，就是無法上學、每天在家幫忙農事與家務。連孩童都感受到的生活困難，使得他們的父母或兄長聽到招募八重山移墾者的宣傳當中強調「八重山有許多土地」，大為心動，加上從八重山回來的初期移墾者口耳相傳，以地緣及血緣人脈為中心迅速吸引許多人加入。台灣西部因為漢人移民湧進而耕地不足，對於在地農民來說，「八重山」這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地名所意味的，就是能以很低的代價租借到土地進行耕種的「開墾地」。然而，台灣人的移墾石垣島被當地的報紙《沖繩日報》以頭條「台灣人四百人偕同水牛佔領石垣島」的標題大肆報導，呼籲民眾加以阻止。石垣島居民擔憂長男以下的男丁將失去可供開墾的土地，除了抵制台灣人的農場工人招募，更以植物及家畜防疫的名目，阻止台灣人引進的10萬株鳳梨種苗（1935年）¹¹及60頭水牛（1938年）上岸（林堯1984：26-33）。居民無法阻止同樣是日本帝國國民的台灣人本身上岸，只能想辦法阻止其開墾所需的動植物，希望台灣人因此打消移居開墾的念頭。另一方面，對台灣農民集團的恐懼，轉化為對鳳梨、水牛等不熟悉的生物集團之恐懼，進而以動植物防疫作為圍堵的策略，整個過程呈現出受到生存競爭強化的異民族排斥之生物學色彩。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的台灣人，進入石垣島之後與在地居民關係一直很緊張，在1939年演變成嚴重的對立。事情起源於台灣人砍伐樹木作為焚田開墾

11 關於鳳梨傳入八重山的歷史請參照牧野清(1972: 414-415)。

之用，發現在地居民撿拾他們砍下的樹木回去當柴燒，經常引發衝突。1939年因類似事情引發鬥毆事件，造成八重山人受傷，事後數百名石垣島居民包圍大同拓殖株式會社，並發生數起台灣人在市街遭受襲擊的事件，雙方對立愈演愈烈（林堯 1984：38-43）。因為這起鬥毆事件而遭受逮捕的一位台灣人（已過世）之妻回想當年情景，對我解釋道：「我們不是不讓他們撿木柴，是要叫他們等焚田完了之後再來撿，可是語言不通，就打起來了。我們沒有故意要跟他們打架」。然而，說完之後她又自言自語般地咕噥一句：「不過對他們來說，燒得烏黑的木柴根本不堪使用……」。移墾初期台灣人與八重山在地居民之間的衝突，通常被解釋為因「語言不通」引起誤解所致，然而，在語言溝通的問題之前，已經存在爭奪土地資源（木柴）使用權的經濟利害關係，這才是引發衝突的主因。為了解決這樣的對立與衝突，台灣人在1940年成立了「八重山台友會」。我曾詢問一位高齡的台灣人是否曾參加台灣人的聚會「台友會」，他的回答是：

台友會？我有去開過幾次會。那不是台灣人在開會，是日本人在開會啦！幾個做頭的台灣人跟日本人在前面致詞，因為是講日語我完全聽不懂。我就只是坐在那裡，看人家舉手就跟著舉，看人家拍手就跟著拍，沒幹什麼啦！

這樣的回答讓人頗為意外，我向他反覆確認他說的是「台友會」，而不是當地以日本人為中心的里民大會之類的。之後，我閱讀台友會成立大會的地方報紙報導，才了解為什麼至今仍不大會說日語的那位台灣人，會將60年前出席的「台友會」記憶成「日本人在開會」。該報導的標題為「八重山台友會誕生、皇國國民的嶄新出發」，記載當時的成立大會除了110名會員之外，還有八重山的行政首長、警察局長、鄉鎮市長、學校校長等40位來賓列席。台友會聘請八重山行政首長與警察局長為顧問，成立的宗旨包括：善盡「皇國國民」的義務、制定商品價格等經濟控管、「標準語」¹²的學習等等，最後才附加一項同鄉會基本功能的「會員之間的相互扶持與救濟」（《海南時報》1940年10月23日；林堯 1984：51-52）。



雖說1938年在台灣的八重山人也因應戰爭體制，另外成立「在台北八重山鄉友同志會」，但他們以「有愛鄉心才有愛國心」之口號，主要訴求為八重山鄉友的團結（《海南時報》1938年4月8日）。相對之下，八重山的台灣人同鄉會邀請地方行政官僚與權勢者列席成立大會，以日語而非大多數台灣人所使用的閩南語為會議語言，迎合帝國意識形態，將善盡「皇國國民」義務以及「標準語」的學習¹³定為重要宗旨，試圖以「皇國國民」這更崇高的分類，消弭台灣人與石垣島居民之間的民族差異及經濟利益衝突。在台灣人領袖組織台友會進行種種努力之下，雙方的直接衝突暫時緩和，然而對彼此的偏見與歧視依舊存在，石垣島居民將台灣人稱為「Taiwa·nā」，台灣人則稱石垣島居民為「Kyū·ā」（球仔，琉球的「球」加上閩南語語尾詞的「仔」），兩個稱呼都有輕蔑之意。

從1920年代後半到1930年代，受台灣「殖民地景氣」吸引的八重山人、尋求「開墾地」的台灣人，分別向台灣的都市區域以及八重山的山林區域移動。雖然當時的日本不斷強調，超越日本本國／殖民地、日本人／台灣人、都市／農村等界線的帝國共同體已經實現，台灣與八重山之間勞動力的交換過程，卻呈現帝國內部種種難以消弭的差異與歧視。八重山人與台灣人同樣在移居的實踐當中面臨帝國內部的歧視與排他，依照其政治屬性（殖民者／被殖民者）與經濟屬性（受殖民地景氣吸引的都市勞動移民／尋求開墾地的農民集團）的差異，分別凸顯不同的日本帝國內部區分，生產出兩個不同性質的同鄉會組織。以「殖民者」的身分在台灣的日本人社會底層討生活的八重山人，面對多重的離島歧視，想像地回歸故鄉八重山；身為「被殖民者」的外來民族而遭受排斥的台灣人，與當地居民保持距離從事農業開墾，同時也被迫向「日本」誓誠。兩個同鄉會面對戰爭體制的不同

13 在爭奪柴薪的鬥毆事件記載當中，提到石垣島居民使用「方言」（林癸1984：41），台灣人領袖使用日語跟居民溝通時，需要有人居中進行日語與石垣島方言的「翻譯」（41），可見當時在地居民普遍使用方言而非日語。由此可知，「標準語」日語的學習，並非以跟石垣島居民的溝通與交流為目的。

因應方式，呈現出他們在日本帝國－沖繩縣－殖民地台灣的層級結構當中，各自所處的尷尬位置。

三、多種語言的交錯與對話

不過，不管是八重山人或台灣人都將出身地的地緣、血緣、人脈移植到移居地，在生活與情感層面都對其相當依賴。這些地緣、血緣的人際網絡作為語言共同體的特徵相當顯著，它們與周圍在地社會之間的交界處，正是多種語言透過日常生活實踐互相交錯與對話的場域。戰前的八重山群島雖受日本統治，天高皇帝遠的情況下家庭社會等日常生活依舊使用各個島嶼的方言，或是混雜使用方言與日語。即使是在學校教育的現場，一直到1930年代末期，日語的使用都還不是很徹底。¹⁴因此，1930年代以前到台灣工作的八重山人當中，有不少人是到了台灣之後，面對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日本人，必須以標準日語互相溝通，才開始學習日語。¹⁵從八重山群島到台灣工作的人當中，竹富島的人尤其佔很高的比例。¹⁶《誰不思念故鄉：昭和時期的竹富島》（誰か故郷を想わざる：昭和の竹富）一書紀錄竹富島在昭和年間發生的奇聞軼事。書中設有「台灣逸事」一章，紀錄竹富島居民的台灣經驗，內容多為竹富島鄉民在台灣的日本人商店或家庭工作，因語言文化差異和日本人雇主之間產生誤解或鬧出笑話的故事。另外也有和台灣人之間發生的趣事，譬如在台北乃木町的軍官宿舍工

14 1939年石垣尋常高等小學校（等同於現在的國小）首先展開「標準（日）語」運動，之後各校紛紛跟進。主要內容為：在校內校外都使用日語、即使是感嘆詞或脫口而出的方言也都要徹底改除（《海南時報》1939年4月29日、7月1日）。

15 有研究者提到，戰前沖繩縣民必須使用日語的場合，主要是在離開沖繩到日本其他縣市或海外（長久移民或短期工作）、或是進入軍隊等，與沖繩縣外的日本人頻繁接觸的狀況之下（近藤健一郎 1997：31）。

16 竹富島的土地不適合種植稻米，居民為了繳納賦稅的稻米，被迫每天搭乘竹筏到瘴疾肆虐的西表島耕種。即使在人頭稅廢止之後，竹富島居民為了生活也只能繼續跨海耕種，無法忍受的居民紛紛向島外尋求出路。

作的佐加伊ハツ就發生以下糗事：

接著她到菜市場。她指著冬瓜表示要買，「你仔」(ri·Ya)¹⁷說：「你要告訴我名字啊」。她答道：「我叫ハツ」。「你仔」說：「不是人的名字，菜的名字，說，就好」。

於是她便回答：「シヨボレ」。「你仔」沉默了一下，跟她說：「這個不叫シヨボレ，叫トウガン……」，才把冬瓜賣給她。從此以後，佐加伊ハツ不管走到哪裡，大家都知道她叫做シヨボレ。(大山正夫 1985：123)

沖繩與台灣的食物及料理法很相近，都常食用冬瓜，然而，台灣人也許知道冬瓜的日語叫トウガン，卻不會知道冬瓜在竹富島方言叫シヨボレ。有趣的是，賣菜的台灣人雖然「教導」買菜的客人冬瓜的日語，其本身使用的日語，卻是缺少助詞的拼湊式「台灣式日語」(大山正夫 1985：127)。在日本人商店或家庭工作的八重山人常被交代跑腿的工作，頻繁出入台灣人的庶民社會，這樣的生活實踐，使得他們每天都在跨越殖民地不同民族與語言的分界線。從這本書當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殖民者社會或被殖民者社會，八重山人夾雜出身島嶼方言與文法的「日語」，都顯得非常怪異。「台灣逸事」裡的故事在成為文本之前，歷經多重「翻譯」的媒介。這些故事發生後，首先在台灣的竹富島鄉親之間流傳；之後，再由回竹富島省親的人以夾雜日語單字的方言，向故鄉的親朋好友轉述。這本書的作者大山正夫沒有長期居住台灣的經驗，戰後他與當年曾到台灣工作的人聚集聊天，除了紀錄他們記憶中的這些故事，也將這些故事傳播的現場（譬如前引文最後「從此以後，佐加伊ハツ不管走到哪裡，大家都知道她叫做シヨボレ」的部分）加以紀錄，最後將這些材料以日語文章重新加以編排表現。書裡台灣及竹富島當地的語言，大多透過上下文或括號註解來幫助讀者理解，不過還是有些地方未加註解，使得日語讀者不易理解故事內容。也就是說，「台灣逸事」透過多重的翻譯來再現殖民地多種語言交錯的現場，以片假名表記的島嶼方言或「台灣式日語」等意義不明的「聲音」，使得日語的文本隨處產生龜裂。

17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日本人叫台灣人時使用的輕蔑稱呼語。

此外，八重山人在殖民地台灣的言語經驗，只有同島嶼、使用同方言的人才能共同分享；即使來自同鄉，又依照他們到台灣的時期、年齡、經歷與職業等個人差異，而有不同經驗。尤其不同世代的人之間，差異特別明顯。譬如說，我實際接觸的八重山人多在30年代來到台灣，或是年幼時跟隨父母赴台，他們的經驗跟「台灣逸事」裡不懂日語的早期渡台者就很不一樣。有些人表示，日語是他們熟悉的語言，反而是父母或親戚之間交談使用的島嶼方言，聽起來比較像「外語」。另外也有位八重山人告訴我，一直到現在，他的家人還會在餐桌上用閩南語說「好呷、好呷」，也有人展現自己記得的閩南語歌曲片段或單字。八重山人在台灣雖然沒有機會學習被殖民者語言之一的閩南語，然而，當時台灣人庶民社會以閩南語而非日語為主要語言，使得這些單字或歌曲作為一種「聲音」銘刻在他們的記憶當中。

與八重山人類似，從台灣到八重山移墾的農民大多不懂日語。我所訪談的台灣人在台灣時幾乎都沒什麼與日本人接觸的記憶，也不會感受到殖民地統治。不只是當時年紀還小的人這樣覺得，就連某位長期向製糖會社租借土地、預借種苗及肥料從事農業、直到25、6歲才離開台灣的男性也表示：「那時候有日本人啦，不過我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們」，顯示出雙方之間缺乏直接接觸。移居八重山之後，台灣人遠離石垣島居民居住的市街，在名藏、嵩田山區從事農耕，但無法自給自足，還是得上街販售農產品來購買生活必需品。他們背著農產品，沿著被當地居民所騎的馬踩得凹凸不平的山路，從山上步行一個半小時後抵達市街，辦完事情之後，再花同樣時間返回。台灣人居住的「山上」與石垣島居民居住的「市街」，這兩個隔絕的生活空間，除了將兩者的民族區別加以地理化呈現之外，同時也是語言的分界。前述25、6歲才移居八重山的男性回想當年：「我們台灣人在山上講台灣話，可是有時候到街上買東西，一開始連鹽巴、醬油都不會說，很傷腦筋」。這些在台灣不曾經歷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台灣人，到了石垣島市街進行柴米油鹽的日常經濟交換時，第一次接觸到「日語」及「日本人」。最初只能比手畫腳，將硬幣放在手心讓賣方直接拿取，接觸久了之後，台灣人開始慢慢學會一些日語，也注

意到在市場頻繁使用的是跟日語不同的「他們這裡人的話」。我遇到的台灣人雖然不會說在地方言，但他們的日語當中，除了混有閩南語語尾及腔調之外，還可辨識到石垣島當地獨特的日語腔調之影響。

綜合以上，欠缺日語運動或殖民地教育經驗、沒有直接受到日本同化政策洗禮的八重山人與台灣人，設法將出身地的地緣、血緣人際網絡移植到移居地，在內部彼此互相團結，卻也不免與語言共同體的外部有所接觸，不得不將「母語」切換為「日語」。然而，在切換的過程中，他們也聽取到充斥於在地庶民生活空間的另一個「母語」，在這多種語言互相交錯與對話的現場，混種的「日語」在他們之中逐漸產生。

四、「現代性」的遠近法

透過前面兩節的討論，我們看到八重山與台灣人依照出身地的政治經濟屬性，呈現出日本帝國內部多種互異要素彼此接觸、衝突與折衝的過程。接下來，我將討論在上述背景所產生的八重山與台灣人之移動經驗，如何影響他們對於「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的建構。兩地之間的接觸，從一開始就與「開發」、「現代性」等相關論述密不可分。譬如說，鹿兒島出身的植物學者田代安定在1885年曾以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囑託的身分前往八重山進行調查，提出民俗、動植物、人類學等調查報告，向明治政府建議進行八重山開發，但未獲採納（三木健 1980：67-131）。後來田代轉向日本的新領土台灣，他先以總督府技師與民政局殖產部農務課員的身分進行東台灣調查，之後在總督府的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1902年成立）進行栽培工作。1928年田代安定過世後，任職於總督府專賣局的八重山人石垣用知在《八重山新報》連載文章，介紹田代的一生。¹⁸石垣提到，1894年春天，

18 1929年11月，台北建立田代安定紀念碑時出版的紀念書籍《田代安定翁》當中，主要取材於石垣用知的連載介紹（三木健 1980：84）。

田代的八重山開發提案終於有點眉目，卻沒想到，一場日清戰爭使得台灣變成日本的領土，日本關心的焦點也隨之移轉到比八重山大上十幾倍的台灣。當年積極提案將八重山西表島的熱帶森林納入國有林保護的田代，轉而參與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的籌畫，等於是將「為八重山擬定的計畫方針，改於台灣付諸實行」。石垣在文末感嘆道：

田代積極提倡八重山開發、以此為畢生志業，原本也是為國家大局著想，既然開發台灣比開發八重山對國家有益幾倍、幾十倍，也只能放棄八重山吧！假設當年日本國勢強大、不受外國牽制的話，田代安定努力的八重山開發應該早就完成了吧！又，如果台灣晚點成為帝國的領土，正如田代所主張在國防與產業上具有重要性的八重山開發，應該早就實現了吧。面積狹小的八重山已經遠遠落後了。它的存在甚至為世人所遺忘。至於台灣的情形如何？交通產業等物質文明相當發達，教育等精神文明也有大幅進步。反觀八重山的情形呢？至今依舊維持原狀，沒有什麼拿得出來的國家設施，物資也很缺乏，說它是日本，不過是有名無實罷了。（《八重山新報》1929年1月25日）

不只八重山，整個沖繩都曾被視為日本帝國國防樞紐及熱帶產業要地，並開始進行產業開發，卻因新殖民地台灣的出現而中斷。¹⁹只不過，八重山為鄰近台灣的偏遠離島，受到的衝擊最為明顯。事實上，田代到台灣之後與總督府意見不合，所提出的台灣開發意見幾乎未受採納，然而，對於八重山人石垣用知來說，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的設置與西表島熱帶森林國有計畫的未獲實現形成強烈對比，宣告八重山「國防與產業上」的重要性已為台灣所取代，八重山失去現代化開發的機會。尤其是，八重山與日本的新開發對象——殖民地台灣比

19 2002年秋天我參加沖繩的又吉盛清老師主辦的歷史之旅，造訪沖繩人在殖民地台灣的軌跡。除了連我在內的三個台灣人（五年來首次有台灣人參加）之外，30幾個學員幾乎都是沖繩人，其中不少是本人或父母戰前曾居住過台灣。參觀戰前的台北醫院（現在的台大醫院）時，大家抬頭望著大廳天花板，讚嘆一個世紀以前的日本帝國竟有如此財力與技術完成這麼華麗的建築。這時，站在我身旁的某位中年沖繩人女士突然說了一句：「台灣是（日本的）一級殖民地，沖繩是（日本的）二級殖民地」。將日本縣市之一的沖繩稱作為「殖民地」，而且是比實際上的殖民地台灣更低的「二級殖民地」這種說法，讓我聯想起戰前沖繩人在台灣目睹現代化建設之際，原先就已不大穩固的日本人認同更加受到動搖的情形。

鄰，鄰近的殖民地台灣在物質與精神上的「大幅進步」，更加凸顯現代化開發中斷的八重山「已經遠遠落後」。

不過話又說回來，八重山也因為與台灣相鄰，在經濟上有所受惠。除了提供工作機會，兩地之間貨物的交流也相當頻繁。以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²⁰為例，從1910年代開始，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的往來漸趨頻繁，除了幾乎每天往返一次的引擎動力船外，還有漁船往返。之後，航行沖繩本島中心的那霸與基隆之間的大阪資本之商船、郵輪、徵兵檢查的船隻，到台灣之前也都先停靠與那國港口。利用這些頻繁的船運，與那國向台灣出口肉豬、魚類、柴魚與石灰石等原料，並從台灣進口新式農耕機械、新品種稻米、麵粉、麵線、檜木等幾乎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雜貨（渡辺欣雄 1985：415-416）。²¹1929年與那國從台灣進口的物品清單，依照類別來看，進口金額最高的為米、大豆、麵粉等日用雜貨，其次為機油、金屬、漁船工具等專業工具。除此之外，從水泥、圖書文具、醫療用品，到手錶、唱片、洋傘或中國傘、玻璃製品等奢侈品，也都出現在清單裡（《八重山新報》1933年5月15日）。1930年代之後的與那國從台灣引進許多現代生活所需物品，甚至有人說，與那國所有「現代生活」所需物品，幾乎全從台灣進口（須藤利一 1936：58）。我所接觸到的與那國人都以驕傲的語氣說，戰前的與那國是「全沖繩，甚至全日本物資最豐富的地方」。也許是意識到這樣的說法與與那國之現況（仰賴每週進港兩次的渡輪補充島上欠缺的蔬菜等物資）有所差距，他們大多隨即補充：「經由

20 與那國島離商船進港的基隆約153公里。相對之下，離八重山行政中心的石垣島127公里，離沖繩本島中心的那霸520公里。

21 農業的不振以及對台灣貿易的興盛，使得原本位於中央台地的農村轉移到靠海的祖納(Sonai)進行開墾，並帶動比川(Higawa)、久部良(Kubura)兩漁村的繁榮。當時台灣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台灣銀行券」在與那國通用，與那國可說被包含在台灣經濟圈當中，整個生活大受影響（渡辺欣雄 1985：416-417）。戰前與那國鄉民在台灣的主要工作場所在總督府、鐵路局、大阪資本的台灣公司、商店，或從事漁業、警察、理髮師、教員、照相館等工作，女性所從事的職業則為幫傭、護士、接生婆、教員、郵局、美髮師或裁縫等（富里康子 1992：178）。富里康子接受我的採訪時表示，一般來說男性以商店打雜，女性以在日本人家家庭幫傭最多，後來從事專業工作者在取得執照之前，也多有打雜幫傭的工作經歷。

八重山往返那霸與基隆兩地的大阪貨輪兩個月才開一次，與那國與台灣之間的引擎動力船卻是每天來回呢！」隨著現代物資的引進，「日本」的文化也隨之進入八重山。有位戰後出生的與那國女性提到她70年代到沖繩另一個離島區域宮古島跟朋友一起過年，發現朋友一家人不知道北海道特產「かずのこ」（曬乾的青魚子）的吃法，也不知道日本人過年時所喝的「お屠蘇」（屠蘇酒），讓她很驚訝，因為「這些在與那國，從戰前就已經算是常識了」。八重山對於現代物資及日本文化的吸收，另有從東京和大阪直接引進、經由那霸間接引進等途徑，然而，以繞道殖民地台灣「回流」八重山的途徑最為迅速。²²就這樣，戰前的八重山地區以與那國為窗口，在沖繩縣內率先引進「現代」及「日本」的物質文化，並引以為傲。

隨著日本版圖向南方擴大，八重山的國防與產業地位為殖民地台灣所取代，現代化開發半途而廢，卻也同時從帝國「邊境」的貧困離島，搖身一變成為殖民地統治的前鋒，同時也成為吸收移植到殖民地的現代文化與日本文化之「最前線」。相對地，引起地政學逆轉的帝國版圖變動，也促成台灣人農民集團到八重山進行移墾。1937年，在前述石垣島報紙媒體反對台灣人移居八重山的聲浪當中，有一篇文章針對在地年輕人紛紛離開故鄉，八重山逐漸被「文化程度低劣」、「生活水準低劣」的台灣人所「佔領」之情形，表示擔憂。其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

離開台灣到島外去的台灣人每個都很惡劣，在台灣尤其以新竹到彰化之間的人最為糟糕，員林一帶智慧型犯罪的人特別多。

我們回頭看台灣人移居的歷史就會發現，當初從福建到台灣的時候，他們是名符其實的流浪漢，帶著一支扁擔與畚箕就來了。話說他們生活水準低劣，具有水牛一般頑強的生活能力，即使當今聞名日本全國的（台灣人）富豪，追根究底也都是流浪漢出身。臭蟲這種東西你用什麼樣的消毒水也無法打敗牠們，一旦牠們開始蔓延就無法將其驅

22 戰前從日本寄信到與那國，收件人住址寫「台灣基隆郵局轉與那國村」遠比寫「沖繩縣八重山郡與那國村」早抵達收件人手上（《八重山每日新聞》1997年6月22日）。

逐。雜草也一樣，如果沒有在剛長出來的時候加以剷除，將來一定會後悔。台灣人甚至連瘧疾都不怕……。 (《海南時報》 1937年5月11日，原文以空格區隔句子，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以水牛、臭蟲、雜草等生物，來比喻台灣人低劣的生活水準與頑強的生活能力，與阻止鳳梨種苗與水牛進入的行動一樣，都顯示出受到生存競爭強化的異民族排斥之生物學色彩。在這裡要特別留意的是文章裡建構台灣人刻板印象的修辭方式。這篇文章首先說離開台灣的台灣人「每個都很惡劣」，進一步點名移民八重山的台灣農民主要的出身地——新竹到彰化之間，表示這些地方的人「最為糟糕」，透過離鄉背井的行動與出身地，斷定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本質「惡劣」。接著，話題突然轉到「台灣人移居的歷史」。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全部都是閩南出身的漢人，作者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提到台灣漢人當初從福建到台灣時，都是身無分文的流浪漢，即使是幾個世代之後累積財富的人也一樣。作者將台灣人的八重山移居與他們的祖先從福建移居台灣的歷史重疊，一方面試圖透過歷史來證明「流浪漢」為台灣（漢）人的民族特質，另一方面也營造出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將重演他們祖先只帶著「一支扁擔與畚箕」就從福建到台灣開墾的歷史，佔領八重山耕地之想像。²³就這樣，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被他者化為無土地財產的「前現代」（農業社會之前，文化與生活水準低劣的）流浪漢集團。這篇文章標題為「台灣諸位前輩的意見」，暗示作者為居住台灣已有一段時日、對台灣人相當了解的八重山人，藉此賦予其意見權威性，這也顯示從八重山到台灣、從台灣到八重山，兩個方向的移動彼此之間互相呼應的情形。²⁴八重山的台灣人祖籍為福建，殖

23 反對將公有地租借給台灣人的當地報紙文章，即是使用八重山將會成為「台灣的八重山」這樣的表達方式。

24 星名宏修討論殖民地台灣與八重山之間的雙向移動時，也論及八重山人在殖民地台灣首次接觸現代文明的經驗（星名宏修 2003：173-174），以及我引用的這段報紙文章均顯示出八重山人的台灣經驗助長八重山社會對台灣移民之歧視(188)。不過，星名論述的重點在於八重山人（或沖繩人整體）如何在帝國之下受到日本人歧視，轉而歧視被殖民者的台灣人之多層權力關係，他並沒有留意到「現代性」的知識結構如何將前者（八重山人的現代文明體驗）與後者（將台灣移民視為前現代流浪漢集團）銜接在一

民地台灣的現代與日本文化則來自日本帝國的首都，由此我們可以說，八重山與台灣之間兩個不同方向的移動，造成不同時間移植到台灣的「日本」與「福建」，再度移植到八重山之現象。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遠離八重山而去的「現代化」開發與「日本」文化，隨著八重山對殖民地統治的參與，又以迂迴的方式再度向八重山接近，同一時間從殖民地台灣引進八重山的，還有源自福建的「前現代」被殖民者集團。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統治下八重山—殖民地台灣之間人的移動與「現代性」建構的相互作用，受到以下三個歷史事件很大的影響：地政學位置的轉變、不同民族間的接觸，以及文化的再移植。以下，我將以八重山及殖民地台灣各自的歷史地政學為基礎，分析因人與物資的移動而產生的民族接觸（第五節）及文化的再移植（第六節），如何建構出「現代性」的相關知識結構。

五、「生蕃」、纏足、瘡疾特效藥

1924年，有位石垣島居民與父親到台灣探望在基隆鐵路局工作的哥哥，父子兩人每天到台北四處觀光，他在1980年代出版的自傳當中，回憶當時在台北觀光的往事。

參觀過的地方當中，以博物館印象最為深刻，尤其是高砂族的農具及生活用具，更是尖銳地刺痛我們的胸口。因為，當時普遍將台灣原住民稱作生蕃，視為野蠻人而加以蔑視，然而，他們所使用的農具，卻跟我們在石垣島慣用的農具一模一樣。當時在現場雖沒有說出口，我們心中卻湧現出自己與生蕃為類似民族之感，而感到很丟臉。譬如說白、杵、畚箕等用具，跟我們在島上使用的其實沒有兩樣，我們根本不覺得稀奇，卻要拼命裝出一副很稀奇的樣子參觀，現在回想起來還真可笑。（石垣稔 1986：68）

事後回想起來雖然覺得可笑，但可以想見當八重山人看到台灣

起，製造出矛盾與倒錯的現象。

總督府、三線道廣闊道路等台北的華麗建設之後，在帝國展示「野蠻人」「生蕃」的文化之博物館空間，「發現」自己在八重山每天使用的農具與生活用具時，內心的衝擊有多大。事實上，確實有八重山人在台灣被日本人辱罵為「琉球生蕃」（高本正宜 1995：46）。八重山民間口傳裡對外來民族的恐懼²⁵、日本國內將台灣視為獵人頭族之島、沖繩歧視²⁶等等，不同時代環繞「生蕃」形象打轉的論述，透過在殖民地台灣的實際生活經驗而受到強化，使得在博物館參觀的八重山人，覺得跟「生蕃」文化相近、為類似民族，是件丟臉的事。

不過，除了被派遣到山上的警察或教師之外，大部分八重山人居住在台北、基隆、高雄等都市，直到戰爭時期疏散到山上，才有機會實際接觸到台灣的原住民。除了日本人雇主之外，日常生活當中他們接觸最多的其實是台灣漢人。在許多八重山人的記憶裡，當年從基隆港上岸時，第一個出現在眼前的台灣景色，就是在港口紛擾的人群當中蹣跚行走的纏足婦女。有位與那國女性以複雜的表情告訴我：「剛看到時我心裡想：好可憐喔！可是我馬上又想到，在八重山大家都打赤腳，連鞋子都沒得穿」。後來她還聽人家說，在中國，纏足是

25 八重山群島與台灣之間非正式的接觸有很長的歷史，黃智慧透過漂流、逃亡與走私的相關史料，推論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期兩地之間的民族接觸與文化類緣關係（黃智慧 1997）。然而，在與那國的民間口傳當中，鄰近的台灣卻以「海盜及食人族的蠻族之島」這類非現實的形象出現（渡辺欣雄 1985：421）。1894年，笹森儀助在遊記《南島探險》當中，就指出與那國的「放草鞋」祭典（為了嚇阻島外的「異邦人」入侵，將巨大的草鞋放入海中漂流，製造出「有巨人住在這個島上」之假象）是以台灣為對象。學者原知章也指出，島外學者笹森儀助將與那國民間口傳裡「生蕃—食人族」之形象與台灣連結，帶有將台灣塑造成與那國=日本的外部，「劃定領土明確的界限，以建立界限內部文化同質的民族國家之視線」（原知章 2000：54）。

26 在日本人歧視沖繩的論述中，常因外觀、生活習慣與文化的類似性，以「生蕃」野蠻未開的形象來污穢與台灣相鄰的沖繩。沖繩縣民對此相當反感，報章媒體也呼籲沖繩不要輸給殖民地的台灣，免得與「生蕃」相提並論（小熊英二 1998：286）。在殖民地台灣，有漢人在街上看到「穿著琉球服飾、手上有刺青，赤腳行走叫賣」的沖繩婦人，嘲笑其為「日本生蕃」（又吉盛清 1990：54-5）。被殖民者的台灣人逾越本分嘲笑殖民者沖繩人為「日本生蕃」，可能多少感覺到日本人社會對沖繩人的歧視。

不須勞動的上流階級之象徵。另外有位石垣島人到基隆、台北工作，發現每個人腳上都穿著鞋子，覺得「真是進步的大都市」（高本正宜 1995：45）。從八重山人的角度來看，殖民地台灣的風俗改善運動，主要是要廢除中國傳統「上流階級文化」的吸食鴉片與纏足，與沖繩縣或八重山的改善「落後」風俗，意義大不相同。有人爲了與「生蕃」的文化類似性而苦惱，有人面對台灣漢人的文化感到自卑，八重山人在殖民地台灣的經驗因人而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殖民地台灣的刻板印象（「生蕃」）與民族接觸的生活實踐（漢人）兩者之間的落差，爲八重山人的「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及文化認同，帶來不小的震撼。

另一方面，移居到八重山的台灣漢人也被建構出民族的刻板形象。石垣島居民從居住的沿岸地區騎馬到山上耕種，抵達時已將近十點，他們很驚訝地發現台灣人的田地昨天下午還什麼都沒有，今天卻已整齊地插好秧。這原本是台灣人爲了避開酷熱的日曬，白天先睡覺，等陽光減弱後再到耕地種田到半夜所致，但對台灣人的開墾感到威脅的在地居民，卻將其視爲不可思議的超能力。當時，在地的農業²⁷幾乎完全靠鋤頭進行，一戶平均只能耕種4、5分農地，台灣人使用水牛及新型農具，一戶平均可耕種4、5甲地，高達10倍。台灣人同時還從事副業，種植蔬菜與鳳梨等作物來賣，並且養豬養雞（西表信 1982：30-31）。此外，爲了避開瘧疾而集中居住沿岸地區的石垣島居民，也很訝異台灣人爲何能在因自然災害及瘧疾而荒廢的名藏、嵩田地區²⁸定居及耕種。事實上，當初招募台灣人農民移墾的大同拓殖株式會社，提供其職員及佃農包括山羊、豬肉等家畜、從河裡捕捉的鰻魚、鰲、蝦等以補充營養，對於染上瘧疾的人，則使其服用草藥煎煮的中藥，很少有台灣人因瘧疾而喪命（林堯 1984：46-50）。當地居民傳聞台灣人「因爲有瘧疾特效藥的中藥」才得以順利完成開墾，

27 1896年，以德島縣人爲中心的300多人集團到名藏開墾，首次使用馬匹與機械進行耕種，然而，以糖業爲主的該次開墾最後卻以失敗收場（大濱永丞 1992：25）。

28 1916年7月，名藏、嵩田只剩3戶人家共7人，遭到廢村。

將帶有神秘色彩的中藥誇大為「特效藥」（新崎盛暉 1992a：80）。當時關於台灣人生產力與生命力的種種傳聞，無視於長時間的勞動、生產型態的差異、營養攝取之現實狀況，一味強調台灣人具有驚人力量，對其進行民族的「他者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民族接觸，同時也是外來民族恐懼、殖民地歧視、歧視之轉移、不同民族間的力學關係等文化與歷史因素的混合體，被置換為「民族」、「現代性」等相關論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農具、生活用具、赤腳與纏足、疾病療法等「文化」，與特定「民族」互相連結後，作為「現代化」發展各階段的視覺呈現，被運用於將現代性加以「民族化」的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文化人類學者費邊(Johannes Fabian)所提出的「對同時存在之否認」(denial of coevalness)，以不同的形式運作於其中。²⁹問題是，在此將「民族」轉換為「現代性」的媒介要素——「文化」，本身也是牽涉不同民族移動之產物，這使得它所製造出來的「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更形複雜。以下即針對影響兩地民族接觸經驗的「文化的再移植」作進一步討論。

六、繞道回流的「日本」、再移植的「閩南」

原先只懂得出身島嶼方言的八重山人，透過在殖民地台灣的工作與生活，漸漸學會日語。當時普遍認為，「從台灣回來的」八重山女性，不但「標準語說得好」，還學習到「賢妻良母」、「大日本帝國國民」精神等現代日本中產階級家庭之規範（浦崎成子 1996：146）。據曾在台灣幫傭的八重山女性所言，雇主的日本人太太教她們許多事，從日語的應對進退，到接待訪客的方式、日本料理的作法、裁縫等。有位與那國女性回想她23歲時剛到台灣之後的經驗，她

29 費邊批判西方人類學者將非西方人種建構為「他者」，將自身與其調查的人種放置在不同的時間「進化」階段，無視於雙方同時存在於田野調查現場的現實(Fabian 1983: 25-35)。

沒有交代輾轉更換幾個幫傭家庭的前後經過，突兀地開始談起其中一個小插曲。有一天，剛剛出門的女主人，突然出現在門口，假裝是來訪的客人，要測試新來的女傭跟訪客的應對進退，以及端茶出來的動作。她「重現」當年跟假扮訪客的女主人以日語的敬語應對進退、就桌上的茶具順手「重演」奉茶標準禮儀，優雅的姿態很難跟70年前剛到台灣工作的與那國少女聯想在一起。³⁰然而可以想像的是，當年八重山女性如何學習「扮演」日本人中產階級家庭女傭被要求的「聲音」與「肢體動作」，逐漸將日語及日本文化「身體化」。這種「身體」的變化最顯著呈現的，應該是在八重山人回鄉省親之際。前述大山正夫《誰不思念故鄉》書中，描述竹富島女性從台灣回鄉省親的情景：

到台灣工作的島上姑娘們，每隔兩、三年會回島上一次。她們白皙的肌膚與流暢的談吐，讓島上青年大為心動。去台灣之前在路上遇到也不好意思打招呼、害羞地逃走的黝黑姑娘，從台灣回來時變身為美女，大方地聊起小學時代令人懷念的回憶。講到台灣的事情，三線道路、柏油路、霓虹燈等等從來沒聽過、也不知道意思的名詞，接二連三地從她們口中迸出，青年們聽得津津有味，連夜深了都不知道。島上青年接受到文明開化的洗禮，大為驚嘆，不覺傾心於這些從台灣回來的姑娘們。島上其他姑娘發現，不過兩、三年的時間，沒到台灣工作的自己，已經落後別人十年左右，深深為彼此的差距所苦，暗自下定決心也要到台灣去。（大山正夫 1985：109）

從台灣回來的竹富島姑娘，不管是外觀（「白皙的肌膚」）、語言（「流暢的談吐」）或面對異性的態度（談吐舉止變得落落大方），其「聲音」、「身體」都跟以往判若兩人。她們亮麗的摩登身體，代表了她們口中「三線道路、柏油路、霓虹燈等等從來沒聽過、也不知道意思的名詞」所意味的現代與都市文化，使得因務農而曬得

30 事後閱讀報紙上對該位女性的專訪，才知道奉茶的禮儀是她在與那國的小學就讀時，某個鹿兒島出身的警察之妻來代課時所教，並非從家庭教育中學習（《八重山每日新聞》2001年1月7日）。事實上，八重山人不是到台灣之後突然變成「日本人」，他們還在八重山時就已接觸到部分日本文化，殖民地台灣不過是為這些進入八重山的日本文化，提供一個具體實踐的場所。

黝黑的膚色、保守的風氣等島上的文化，相形之下顯得土里土氣，對島上的性別社會產生不小的衝擊。相對於沖繩本島的人參與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初期的武力鎮壓及道路、港口、醫院等現代化基礎建設，八重山人是在日本統治的基礎大略底定之後才來到台灣，突然進入一個現代化之後的空間。幾乎每一個剛到台灣的八重山人，都對於台灣市街從未見過的電燈、路燈、自來水等設備，感到十分新奇。經過頻頻出糗³¹的「啓蒙」階段，他們在回鄉省親時，成為現代知識與文化的傳遞者，為八重山各個島嶼帶來「文明開化的洗禮」。有不少人對我表示，八重山人透過在台灣的經驗「獲得各種常識，不管到什麼地方都不會丟臉」，「都是託台灣的福」。

石垣用知等八重山的知識分子也許對落後殖民地台灣感到苦惱，不過，在八重山從台灣接受現代物資與文化成為常態後，八重山人對於從「殖民地」引進「現代」文化與「日本」文化這樣的途徑，並不覺得奇怪。尤其是跟隨父母移居的人以及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他們從小在台灣的都市長大，對他們而言，台灣市街的現代化設施與日本文化從一開始就在那裡，而不是從日本引進的。反而是在他們回鄉省親或戰後撤回時，「故鄉」八重山成為一種文化衝擊，需要花時間去適應。有位2歲就跟隨父母到台灣的竹富島女性，回想在台灣生活6年後回到故鄉養病的那1年半，島上「什麼也沒有」，讓她覺得很痛苦，「真想趕快回台灣」。她不會說竹富島方言，因為怕受到排擠，出去玩之前總是刻意將腳上穿的皮鞋脫下來，跟當地孩童一樣光著腳。一直在台灣待到10幾歲的她表示：「台灣是我的故鄉」，對她而言，台灣代表了電影、雜誌等新潮的「現代文化」。

戰前在八重山，匯集最新日本文化的台灣被稱做「小東京」（八重山地域情報センター 2001：4）。從台灣回來的八重山人，以新穎的「聲音」、「身體」與「知識」，帶給故鄉「文明開化的洗禮」，從東京等帝國大都會移植到台灣的「日本」文化，也隨之進入八重

31 譬如說看到路燈，對於如何爬到那麼高的地方點燈百思不解；看到灑水車，以為車子在漏水（大山正夫 1985：121）。

山。殖民地台灣的公營、私營日本人農業移民集團，同樣也來自日本的鄉下地方，但他們在總督府補助之下，建立同鄉者聚集的移民村，少與外界接觸，日常生活仍以故鄉的方言和文化為主。相較之下，八重山人在各縣市日本人及台灣人聚集的都市打雜或幫傭，更容易受到日本中央文化的影響。不過，八重山人似乎沒有將殖民地台灣帶來的「文明開化」跟「日本化」聯想在一起。有不少八重山人在戰後運用在殖民地台灣所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謀生，象徵「現代性」的洗鍊「身體」與「知識」，並非「日本化」的指標，而是謀生所需之「工具」。即使是日語的學習，也被視為理解日本人雇主的指示、順利完成被交代工作的謀生工具。我在與那國試圖確認戰前從殖民地台灣最早引進榻榻米的傳聞，可能時代相隔太遠，大家都表示對這件事不清楚，但幾乎所有的人都隨即把話題帶到，戰爭剛結束時，還好有台灣（走私進來）的米可賣，才生存了下來。³²對他們而言，當時的台灣在「生活」與「生存」上的意義，比什麼都重要。

我所採訪的八重山人對於日本的物資與文化繞道殖民地進來，並不特別覺得奇怪，除了因為現在的八重山已相當日本化³³，也跟八重山人著重「現代」生活的物質層面與實用性有關。更何況，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不只是中央的東京文化，而含括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多樣文化。正如某位竹富島女性所說的，「在殖民地台灣有機會接觸各式各樣的人與文化，開闊了視野」。她接著表示，在多種文化混合當中生活的經驗，促使她在戰後生活穩定之後，開始致力於八重山傳統織布文化保存的工作。曾在台灣生活過的八重山人當中，有不少人跟她一樣，在戰後投入各自出身島嶼的方言、民俗、民謠或民間藝術的保存。此外，戰前從台灣進來的現代物資當中，有不少是西洋的

32 戰後初期與那國成為日本、沖繩與台灣之間走私的中繼站，全盛時期島上人口曾達10,000人。詳見石原昌家(2000: 30-54)。

33 戰後美軍統治沖繩，沒有設置美軍基地的八重山地區被置之不顧，增強了該地區對祖國日本的強烈向心力。許多傳統聖地「御嶽」的入口處，戰前建立的巨大日本式神社鳥居並沒有被拆除；戰死士兵的墳墓也多採用日本式的墳墓建築，不像沖繩本島一樣採用沖繩傳統的龜甲基（新崎盛暉1992b: 135-136）。

商品。從台灣回來的八重山人最直接展現他們身體「摩登性」的，就是他們的服裝。有位石垣島居民在他的回憶錄當中提到，戰前在地居民大多穿著「琉裝」的時代，從台灣回來的人身穿「洋服」，顯得很時髦（ハイカラ，洋氣十足）（大濱永丞 1992：27）。在「和服」還是少數有錢人及日本人才有能力購置的時代，從台灣回來省親的人當中，當然有人以和服的盛裝打扮出現，不過也有人跳過和服，直接從琉裝換成洋裝。到台灣工作的八重山人，一下子從「琉裝」直接跳到「洋服」，就是因為，移植到台灣的「日本」現代文化有很大部分是「西洋化」的文化，摩登的身體不一定是日本的身體。

在現代物質與文化繞道殖民地台灣回流八重山的同時，台灣人將台灣的農業文化引進八重山。所有受訪的台灣人都表示，他們當年移居到八重山時，名藏、嵩田一帶「什麼也沒有」。³⁴有位台灣人回憶說：「沒電、沒自來水、也沒有車子或巴士。他們這裡的人騎短腿馬³⁵，我們台灣人只能用走的。在那時候，我住台中的伯父已經開著車跑來跑去了呢！」當時在台灣已漸漸普及的現代化物資與設備，在八重山的山上完全看不到。不過，當年台灣人對於八重山「什麼也沒有」也不覺得奇怪，因為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八重山不是日本，而是「跟台灣一樣被日本管」的地方。翻閱《嵩田——50年來走過的路》裡的老照片，戰前八重山台灣人的房屋、服裝、農耕用具及祭祀等，跟戰前台灣的農村風景沒什麼兩樣。據說戰前的台灣人移墾聚落，大家各自將房屋建於耕地旁，彼此相隔有些距離，但除了台友會、里民會等以男性為主的正式聚會之外，凡是遇到婚娶或生產等特別的事情，大家都會自發性地聚集，想辦法以「台灣的方式」來進行。不過，正如將台灣人塑造成「流浪漢」的報導所言，這些台灣人為祖籍福建（南部）的漢人，他們引進名藏、嵩田的「台灣」文化，實際上是經過台灣化之後的閩南文化。除了最明顯的台灣閩南語的使用外，

34 即使在市街，石垣電力公司的供電常故障，家家戶戶都另外備有煤油燈使用。從石垣市中心到海岸另一側的白保之間，一天有兩班公車，但也常故障，居民大多騎腳踏車或騎馬代步。

35 八重山特有品種的馬。

台灣人還將「拜土地公」的祭祀活動帶到八重山。俗稱土地公的福德正神為中國自古以來祭拜的農業神，漢人移墾台灣初期，面臨嚴酷的自然環境，在台灣各地建造土地公廟來祈求豐收，普遍程度可用「田頭田尾土地公」來形容（姜義鎮 1995：165-167）。八重山的台灣人開始舉行拜土地公儀式是在1939年，關於其由來以及最初祭祀型態有各種說法，某位曾經實際參與戰前祭祀活動的台灣人男性提供的版本如下：

接連數年為颱風所苦的台灣人，向土地公祈求風調雨順，承諾如果今年採收期沒有颱風災害，將宰殺豬公祭拜表示謝意。結果當年如願以償得以豐收，台灣人便聚集起來舉行拜土地公的儀式。從牲禮到祭拜的方式都以台灣式進行，甚至還有業餘的台灣人粉墨登場，以台語演出「大戲」獻給神明。

根據岡田謙在殖民地台灣北部進行的調查，居住在同一區域的台灣漢人依照大陸的出身地個別舉行祭祀活動，即使是「神明會」這類含括不同區域的祭祀團體，也都由同鄉、同時來台或搭乘同船來台的人所組成。由此可見，支配漢人村落集團生活的祭祀圈，跟家族團體、同姓宗親團體與通婚範圍一樣，都與從大陸來台時的移墾團體密切相關（岡田謙 1938：13、22）。台灣的土地公祭祀也一樣，主要在移居台灣前、在大陸的出身地為基礎的人際網絡當中進行（岡田謙 1938：10-11，表五）。同樣地，八重山的拜土地公向來都是台灣人自己的祭祀活動。雖然從戰前到現在一直都「借用」名藏在地聖域的「御嶽」舉行，沒有自己另闢土地或建築，然而，即使戰後宮古島移民開始在同一個「御嶽」舉行豐年祭之後，台灣人的土地公祭祀並沒有與在地祭典活動合併，戰前的移民傳承給戰後的新移民，一貫由台灣人主辦與進行。我們可以說，土地公祭祀從福建移植到台灣，再從台灣移植到八重山，在移居地均生產出奠基於隨之移植的地緣及血緣人脈之祭祀圈。就這樣，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人與物資的移動，同時促成移植台灣的「現代」文明與「日本」文化回流八重山，以及奠基於「前現代」地緣、血緣共同體的「（台灣）閩南」文化再移植到八重山。

七、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

從八重山到殖民地台灣，從殖民地台灣到八重山，除了在往返途中的偶然同船之外，這兩個方向的移動彼此之間沒有實質交集，如果我們在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各自的地政學當中分別為文討論，將可勾勒出兩條更為清晰的軌跡。然而，將這兩個方向的移動與相關論述行走的軌跡描繪在同一張海圖上，我們發現，出現在眼前的不是直接從出發點到目的地的兩條平行線，而是由無數的曲線、弧線、虛線、斷裂線條彼此散亂交叉的「現代性」形成的軌跡圖。尤其是，文明化、進化、發展、文化變遷等「現代化」、「現代性」的相關概念，有很大成分是透過「時間的空間化」（「先進的台灣」、「落後的八重山」）及「時間的人種化或民族化」（尚未進入文明階段的「生蕃」、農業社會前階段的「流浪漢」）這兩個實踐而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只有在特定地理空間、人種、民族及文化，被依照其開發「先」「後」加以排列優劣順序時，「現代性」才得以成立。然而，與殖民主義密不可分的「現代性」之發生，必然伴隨從帝國首都到殖民地的文化移植，在不同空間、人種、民族與文化互相交錯的情況下，支撐「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的優劣順序，不可避免地受到打亂。這正是「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的矛盾之處。

舉例來說，探討南非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相互關係的歷史專書《啓示與革命：某個南非拓荒地的現代性辯證》(*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的序論部分，勾勒出「現代性」透過殖民地與帝國首都之間的往返運動而逐漸建構之過程。傳教士、商人、開拓移民、傭兵等有血有肉的「帝國代理人」(agents of empire)，比抽象的殖民政府更直接影響殖民地居民，他們自認為是「文明」的傳送者，在跟「前現代」的在地居民接觸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自我認同。同時，他們內部的階級與社會分化，也造成無法以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來解釋的同盟關係（譬如說，對南非的英國傳教士來說，黑人教徒的菁英分子比同樣是白人的當地荷蘭移民更有親近感）。帝國首都中產階級式的「文明」

與「現代」概念本身相當不穩定，不斷面臨各種挑戰，其方法與方向首先傳輸到帝國實驗室的殖民地展開反覆測試，修正之後的版本再次引進帝國本國。在這樣的過程中，中產階級式「文明」與「現代」的概念，透過殖民地的被殖民者及殖民者社會底層、帝國本國內陸都市或下層階級（殖民地與帝國本國的底層被同一而視）所代表的「未開化」與「前現代」之對照組，得以逐漸成形(Comaroff & Comaroff 1997: 19- 29)。

同樣地，日本並不是在現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後」，才開始向外進行殖民地事業，而是透過海外的殖民地事業，回頭建構本國的現代國族認同。在國內大眾媒體生產並消費海外殖民地與被殖民者「前現代」刻板印象的同時，參與殖民地統治的日本人透過與被殖民者的接觸，自我建構為現代帝國主體。以殖民地台灣為例，日本將明治時期從西洋引進日本大都市的現代物資與文化，再移植到台灣，進行法律、制度、產業、教育、社會等各領域的現代化事業。³⁶以殖民者的身分到台灣的日本人，除了東京、大阪之外，以距離台灣較近的九州與沖繩³⁷、農村經濟破產的東北、四國地區的人最多，有不少人是到了台灣，才首次接觸現代（西洋）物資與日本中央文化。³⁸與台灣在地文化互相吸收、挪用、抗衡與混合而產生大幅變化的現代（西洋）

36 具體來說，日本在台灣進行的現代化工程主要包括：一、法治制度的整備。二、經濟資本主義化的基礎事業：調查土地及人口、統一度量衡及貨幣。三、產業發展政策：建設交通網與港灣、興建水利與水力事業、專賣制度。四、糖業帝國主義。五、地方行政制度。六、財政獨立與衛生建設。七、殖民地現代教育（許極燉 1996：255-297）。

37 在台日本人裡，沖繩縣人的比例原本在日本全國排名20名以後，1920年代開始迅速上升，1940年已爬到第4名。前3名均為九州的縣市，依序為鹿兒島、熊本與福岡（水田憲志 1998：382）。

38 從「日本橋的文明開化」一詞可知，明治日本迅速而表面的西洋化「文明開化」風潮首先出現於東京、橫濱、神戶等都市，並未擴散到農村鄉鎮，甚至有地方民眾對其表示反感。經過一段時間，「文明開化」的實用性與合理性逐漸吸引不滿德川封建社會制度的民眾，才在政府的推動下逐漸普及（梅溪昇 1984：103），但在戰前一直沒有延伸到地方鄉鎮與農村，反而因工業化造成農業經濟解體，造成民眾生活困苦。熊本縣南部水俣貧村民眾到殖民地朝鮮的日本財閥工廠工作，生活的落差讓他們感覺「殖民地就像天堂」（星名宏修 2003：169）。

物資與日本中央文化，除了協助在台日本人自我建構為現代帝國主體外，還透過他們「回流」日本本國的地方鄉鎮與農村。包含八重山在內的整個沖繩縣，與日本其他的地方鄉鎮或農村具有不同的歷史與地政學背景，使得當地對「現代」文化的吸收伴隨強制的「日本同化」。³⁹邊境的島嶼群八重山與多樣種族構成的移民社會台灣之間，具有多層意義的邊境、移民社會、殖民地以及帝國交會處，「現代性」相關知識結構反覆進行建構與修正。建構與修正它的多樣民族、人種、語言、文化與歷史，在前帝國時期就已經是「現代性」知識結構的交界場域⁴⁰；透過帝國統治下的移動，這些既有的「現代性」概念彼此交錯與對話，生產出更新、更複雜的「現代性」知識結構。在這個現場所浮現的，正是「現代性」的辯證法本身：首先將進化論的時間進行空間化與人種化、民族化，接著藉由中心／邊緣、帝國／殖民地、文明／未開化、教化者／被教化者等區分，建構出各種「他者」，卻在不斷的移動與混合的過程當中，被這些建構分子的現代／前現代區分所產生的突變與矛盾干擾與打亂。

因此，如果我們拿日本「已完成的現代」作為絕對的標準，依據日本一沖繩一八重山一殖民地台灣的帝國層級，將八重山人在台灣的現代性經驗解釋為國內縣市與殖民地之間秩序的顛倒，將台灣人的八重山經驗解釋為從故鄉台灣的「現代」向八重山的「前現代」移動，那將是無視於雙方移動過程所凸顯的現代性之矛盾與辯證法，對帝國論述進行毫無批判的覆誦。⁴¹事實上，八重山人與台灣人的經驗，正

39 戰爭期間，疏散到九州的沖繩兒童很驚訝地發現，當地兒童在學校自由使用方言而不必擔心受罰。

40 另外一個同樣將帝國下交會的場域加以概念化的用語為「接觸領域」(contact zone)，著重於原本在空間與歷史上隔絕的人們彼此接觸，在壓迫、不平等、衝突的關係當中，互相進行主體建構的過程(Pratt 1992: 6-7)。我選擇「交界場域」一詞是為了強調，「現代性」的相關知識結構不只產生於不同人種與文化的接觸，更與接觸下各種界線不斷受到重劃的流動過程息息相關。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空間與歷史的劃分及界線，因為人與物資的移動而消滅，然而幾乎在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劃分及界線，整個過程不斷重複進行。

41 我曾以後殖民小說文本為材料，討論殖民地台灣、沖繩與八重山之間的種

是「現代性」透過複數空間、民族與文化的接觸而建構的過程，在其中，「秩序顛倒」與「前現代」並非現代性的「倒反」或「欠缺」，而是構成現代性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現代性之「產物」。換句話說，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現代性」，並不只是發生在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等交界場域上的現象；「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交界場域，一個在帝國政經力學牽動下多樣民族、人種、語言、文化與歷史互相交錯、不斷重劃疆界的場域。

我在這篇論文當中的討論，可進一步擴大到帝國的現代性建構與底層人民、階級、性別等相互關係之各種議題。不同於日本的殖民地官僚及公務員、留學日本的台灣菁英分子，或總督府補助的公營、私營日本人移民集團，當年往返於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人們，主要是離鄉謀生的個人及私人公司招募的農民，畢竟八重山與台灣距離近，一般庶民也可以自行往返。⁴²帝國統治下兩地之間物資與人的移動，雖然是在帝國與殖民地機制的「外部」進行，卻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帝國與殖民地的機制、論述當中；進行移動的人們對於現代性的認知，在受到帝國論述制約的同時，也具有使其產生龜裂的潛在力量。這樣的「現代性」建構也與階級及性別的區分息息相關。不僅台灣的日本人將「女人島」⁴³與那國描述成「沒有處女」的男人天堂（《八

族接觸如何擾亂日本帝國的層級關係（朱惠足 2004）。我在文化研究學會 2002 年會上發表的論文，則討論八重山人的台灣經驗如何顯示八重山群島身為日本本國的一部分，卻從鄰近的殖民地台灣引進現代化物質與日本文化，顯示日本現代化過程的不均等發展與帝國層級的顛倒。該論文只處理單方向的移動，論述的邏輯與過程也只是將日本帝國既有的「現代性」論述與層級顛倒過來，無法針對「現代性」的觀念本身提出有效質疑。因此，我以文化研究學會年會論文的結論部分（朱惠足 2002：20）為本論文的起點，將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現代性」本身定義為交界場域，希望更能聽取帝國大敘事所掩蓋的庶民聲音與生活實踐如何凸顯帝國「現代性」概念的內在矛盾。

42 譬如說從石垣島到台灣三等船艙的船票為日幣 6 元（辻弘 1985：366）。戰前八重山人在台灣幫傭月薪平均為日幣 15 元。

43 據說這個名稱源於有些與那國女性為了逃避人頭稅的繳納，成為中央派來的官吏之妾。官吏任期結束離開與那國後廣為散播的結果，與那國女性的深情與細心服侍普遍流傳（須藤利一 1936：55）。再加上，完全仰賴海上交通的與那國，每當有船隻入港或出港時，男女老幼都會在岸邊迎接或

重山每日新聞》2001年1月11日），戰前八重山在地的報紙也曾報導，在台灣幫傭的八重山女性「品質低劣」、風評很差，後來常「淪落到咖啡廳或酒店」，「十個裡面有五個」最後「挺著大肚子」回到故鄉（《先島朝日新聞》1929年6月20日）。這類帶有明顯性別歧視的批評，也來自八重山的內部。我們在第四節也提到，備感威脅的八重山人賦予台灣人「流浪漢」之負面形象，事實上這樣的刻板印象也流通於台灣人的內部。譬如說60年代之後的台灣人新移民，談到早期台灣人移民時，也常以「犯罪」、「跑路」、「混不下去」等負面詞彙，來解釋他們離開故鄉的動機。當日本資本主義式現代化事業與國內財閥及海外殖民地在地勢力建立同盟，壓榨海外殖民地與本國農工階級進行資本累積的同時，帝國的中產階級現代主體，也在共同體內部生產出各種階級與性別的他者，藉以建構自我認同。然而，我們也不能將關於「現代性」的帝國論述，視為確立不搖的先驗性存在，而必須追溯這些官方論述如何透過往返於帝國與殖民地之間，不斷地重新建構。⁴⁴不限於八重山與殖民地台灣例子，帝國統治下的移動，總是充斥著被「現代性」論述邊緣化的底層人民多樣的人生與喧嚷的聲音；這些移動的實踐者，既非被動地覆誦帝國論述，也非英雄式地將其整個顛覆。帝國統治下被迫離鄉背井的庶民，一邊圍繞殖民地開發、帝國內部優劣排名等帝國據以建構「現代性」之因素轉動，一邊透過移動的日常實踐與歷史主體意識，因應自己所面臨的環境對帝國的「現代性」進行挪用，更進一步地將官方版本的「現代性」論述放在自身的出身背景與生活文脈當中，加以重新解釋。重返這些帝國統治下庶民移動的現場，我們發現到，「現代性」本身，正是互異空間、人種、文化、民族、階級與性別在彼此交錯下，不斷重劃界線之

送行。這樣的習慣被渲染成：「女人島」與那國因為男人出遠洋捕魚長久不在家，女人們在海邊擺放草鞋，船隻進港後外來的船客穿上草鞋後，可以到草鞋所有者的女性家中，接受食物及性的款待。

44 同樣地，帝國的殖民地論述本身，並非完全不受被支配者的介入與影響之先驗性存在，至少包含掌握再現權的帝國學者、替被殖民者代言的在地資訊提供者，以及其他的被殖民者這三者之間的相互抗衡(O'Hanlon 2000: 103-104)。

流動性過程。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朱惠足。2002。〈來自帝國邊境的近代化推動者：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統治〉，發表於「重訪東亞：全球、東亞、國家、公民暨2002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研討會，2002年12月14、15日。台中：東海大學。
- 。2004。〈當沖繩人遇上平埔族：中間英《人與人之間的牆》與葉石濤《異族的婚禮》〉，《中外文學》32(9)：129-160。
- 姜義鎮。1995。《台灣的鄉土神明》。台北：臺原出版社。
- 許極燦。1996。《台灣近代發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
- 黃智慧。1995。〈東方海上的另類遭遇：與那國島與台灣〉，《宜蘭文獻》17期：1-11。
- 。1997。〈人群漂流移動史料中的民族接觸與文化類緣關係：與那國島與台灣〉，《考古人類學刊》52期：19-41。
- 簡瑞宏。1989。〈從石垣島華僑社會看中琉文化交流〉，收錄於《第二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報告：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那霸：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

二、日文書目

- 又吉盛清。1990。《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繩》。那霸：沖繩あき書房。
- 八重山地域情報センター。2001。〈特集：八重山の人々と台湾〉，《あかがーら》第15號。
- 大山正夫。1985。《誰か故郷を想わざる：昭和の竹富》。自費出版。
- 大濱永丞。1992。《大濱永丞私史：八重山「濱の湯」の昭和》。自費出版。

- 小熊英二。1998。《〈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 小熊誠。1989。〈石垣島における台湾系移民の定着過程と民族的帰属意識の変化〉，收錄於《第二回琉中歴史関係国際学術会議報告：琉中歴史関係論文集》。那覇：琉中歴史関係国際学術会議実行委員会。
- 三木健。1980。〈田代安定：近代八重山—辺境のいわゆる“近代化”を一〉，《八重山近代民衆史》。東京：三木書房。
- 。1990。《西表炭坑夫物語》。那覇：ひるぎ社。
- 牛島盛光。1970。〈沖繩における文化変動〉，收錄於窪徳忠編，《沖繩の社会と習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水田憲志。1998。〈沖繩県から台湾への移住：第2次世界大戦前における八重山郡出身者を中心として〉，收錄於関西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編，《地理学の諸相：「実証」の地平》。東京：大明堂。
- 。2003。〈日本植民地下の台北における沖繩出身「女中」〉，関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史泉》第九八号。
- 石垣稔。1986。《平民の世代》。自費出版。
- 石原昌家。2000。《空白の沖繩社会史：戦果と密貿易の時代》。東京：晚声社。
- 西表信。1982。《南嶋昭和誌》。自費出版。
- 辻弘。1985。《竹富島：いまむかし》。自費出版。
- 西里喜行。1981。《論集：沖繩近代史—沖繩差別とは何か》。那覇：沖繩時事出版。
- 沖繩県教育委員会。1974。〈移民〉，《沖繩県史》第七卷。那覇：沖繩県教育委員会。
- 岡田謙。1938。〈台湾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圏〉，《民族学研究》四卷一号。
- 金城朝夫。1999。〈名蔵の歴史〉，《名蔵入植50周年記念誌：自由移民のあゆみ》。石垣：名蔵入植50周年記念事業期成会。

- 近藤健一郎。1997。〈国家総動員体制下の沖縄における標準語励行運動〉，《南東史学》第四九号。
- 松田良孝。2004。《八重山の台湾人》。石垣：南山舎。
- 牧野清。1972。《新八重山歴史》。自費出版。
- 林発。1984。《沖縄パイン産業史》。自費出版。
- 星名宏修。2003。〈「植民地は天国だった」のか：沖縄人の台湾体験〉，《複数の沖縄：ディアスポラから希望へ》。東京：人文書院。
- 浦崎成子。1996。〈日本植民下台湾における女子労働：台湾出稼ぎ女中をめぐる〉，《沖縄・八重山文化研究会会報》第37号（彙編於《沖縄・八重山文化研究会会報1991-1996》）。沖縄：八重山研究会。
- 原知章。2000。〈伝承の正典化：口承伝承の持続と変容〉，《民俗文化の現在：沖縄・与那国島の「民俗」へのまなざし》。東京：同成社。
- 野入直美。2000。〈石垣島の台湾人：生活史にみる民族関係の変容（一）〉，《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人間科学科紀要：人間科学》第五号。
- 。2001。〈石垣島の台湾人：生活史にみる民族関係の変容（二）〉，《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人間科学科紀要：人間科学》第八号。
- 梅溪昇。1984。〈近代日本の出発〉，《日本近代化の諸相》。京都：思文閣。
- 富里康子。1992。〈島のくらしの今、昔〉，《与那国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記念誌 平成3年度》。与那国：与那国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
- 須藤利一。1936。〈与那国島管見〉，《台湾時報》10月。
- 渡辺欣雄。1985。〈沖縄文化の特徴と文化変化〉，《沖縄の社会組織と世界観》。東京：新泉社。
- 新崎盛暉。1992a。〈八重山開拓と台湾農民〉，《沖縄同時代史：1973-1977》。東京：凱風社。
- 。1992b。〈強まる戦争体験の風化〉，《沖縄同時代史二：

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

1978-1982》。東京：凱風社。

嵩田公民館記念誌編集委員会。1996。《嵩田：50年のあゆみ》。石垣：
嵩田公民館記念誌編集委員会。

嵩本正宜。1995。《蟻の詩：嵩本正宜自伝》。自費出版。

三、英文書目

Comaroff, John L. and Comaroff, Jean. 1997.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 Timothy. 2000. “The Stage of Modernity,” in *Questions of Modernity*, edited by Timothy Mitchel.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9.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Hanlon, Rosalind. 2000. “Recovering the Subject: Subaltern Studies and Histories of Resistance in Colonial South Asia,” in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edited by Vinayak Chaturved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att, Mary Louise.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四、報紙文章

1929/6/20。〈南門街に於ける／八重山乙女の行進曲／台湾土産は可愛坊や〉，《先島朝日新聞》。

1931/6/28。〈本郡女性の／台湾進出／女中奉公が断然リード〉，《先島朝日新聞》。

1933/1/25。〈[台湾支局通信] 多年の渴望／台北八重山郷友会生る／大盛会裡にヤーラヨーデ散会す〉，《八重山新報》。

- 1933/5/15。〈与那国村と台湾〉，《八重山新報》。
- 1936/11/9。〈台湾人の貸地開墾は／八重山の重大問題／今後公有地貸付の拒否せよ〉，《先島朝日新聞》。
- 1938/4/8。〈銃後の護りは固し／在台北八重山郷友／同志会愈々結成さる〉，《海南時報》。
- 1939/4/29。〈標準語の家庭化！！／石垣校が本格的に／父兄の協力を要望〉，《海南時報》。
- 1939/7/2。〈標準語行進曲制定／石垣校が近く大行進／作詞は宮良高夫氏〉，《海南時報》。
- 1940/10/23。〈八重山台友会誕生／皇国民として新発足〉，《海南時報》。
- 石垣幼稚。1929/1/25。〈田代安定氏と八重山〉，《八重山新報》。
- 米城忠。1997/6/22。〈台湾基隆郵便局経由与那国村〉，《八重山毎日新聞》。
- 松田良孝。2001/1/5-28。〈台湾・助産婦・参政権：玉城喜美代の半生〉，第一回を除いて毎週日曜日と木曜日連載，《八重山毎日新聞》。
- 玻名城長好。1937/5/11。〈台湾における先輩の御意見（二）〉，《海南時報》。

